

## 論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鄧仕樑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文選》載錄的韻文和散文，以文體分，共計三十七體。其中最重要的文體賦和詩，<sup>1</sup>復以題材細分為若干類，如詩更分為二十三類。分類的原則，固不盡合理，也不免細碎，不過至少可憑此而見當時文士對詩歌內容的概念。

從詩的分類考察，似乎先後次序是按題材的重要性而定的。所謂重要性，自然是就當時的觀念說。如在詩諸類中，先列「補亡」，蓋補《毛詩》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其後即接以「述德」、「勸勵」、「獻詩」、「公讌」、「祖餞」諸類。<sup>2</sup>鍾嶸論詩的功能，大別之為「可以羣，可以怨」。但鍾君論詩，偏重怨情，故所舉發而為詩的事例，其實以怨佔了絕大部

- 1 今本《文選》六十卷中，首錄賦和詩，二體共佔三十一卷，可見二者在當時文類觀念中是最重要的兩類。
- 2 其中補亡六篇，述德二篇，勸勵二篇，獻詩三篇，公讌十四篇，祖餞八篇。從篇數看，並不算多；但從排列的次序看，似乎是按其重要性而分先後的。當然所謂重要，只是當時的觀念，不過這更能表示梁昭明太子時代文學觀與後世的差異。宋人編的《文苑英華》共一千卷，分三十八體。文體的觀念大致與《文選》接近，但在「詩」這一體中的分類，二者卻有顯著不同。《文選》中詩的分類有二十三目：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讌、祖餞、詠史、百一、遊仙、招隱、反招隱、遊覽、詠懷、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樂府、挽歌、雜歌、雜詩、雜擬。《文苑英華》所錄詩則分為二十五目共一百八十卷，數量在《文選》詩十倍以上。二十五目名稱和卷數如下：天部八卷、地部八卷、帝德一卷、應制十一卷、應令一卷、省試十卷、朝省二卷、樂府二十卷、音樂二卷、人事五卷、釋門六卷、道門五卷、隱逸三卷、寺院七卷、酬和七卷、寄贈十九卷、送行二十卷、留別三卷、行邁十卷、軍旅二卷、悲悼十卷、居處九卷、郊祀一卷、花木七卷、禽獸三卷。其中有些類別固然有其時代背景，如「省試」詩，只能出現於實行科舉制度以後。有些則只是名目上的不同，如《文選》稱為「行旅」、「軍戎」，《文苑英華》則名為「行邁」、「軍旅」。但綜覽全局，可見詩歌的分類觀念，從梁代到趙宋四百餘年間，已有很大改變。

分。<sup>3</sup>這固符合中國詩歌抒情傳統的實情；但從內容看，《文選》所錄的首數類詩，則頗合於詩「可以羣」之旨。無論把「羣」理解為「嘉會寄詩以親」，<sup>4</sup>或「羣居相切磋」，<sup>5</sup>這些詩都足以當之。這些詩是不是中國詩的主流，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傳統觀念上，這些到底是不能忽視的題材。本文即舉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加以分析，並對這類詩在傳統詩觀上的地位略加探討。

所謂傳統詩觀，主要是受了儒家影響的詩觀。自漢以來，說詩基本上用儒家的調子。可以說，歷代的文學觀都有儒家的影子。魏晉南北朝倒是比較特殊的時代。簡單地說，這個時代的文士和詩人，在創作和論文時，一般不專以儒學為依歸；有些人甚至被目為背棄儒道，是「棄大聖之軌模」的叛逆之士。後世對六朝人的非議，很可能是由於不滿他們對儒學的態度。不過六朝文人固有崇道、崇佛、甚至薄周孔的傾向，但他們全都讀儒家的典籍，因而筆下根本不能脫離儒家習用的語言。而在論人方面，往往仍然以儒家為規範。<sup>6</sup>我以為謝靈運這兩首《述祖德》詩，很能幫助我們去說明當時人對文學和儒學的觀念和態度。

## 二

《文選》第十九卷繼「補亡」之後的一類「述德」，僅錄詩二首，即謝靈運《述祖德》詩。前面說這類題材在傳統觀念上頗為重要，不難得到旁證。如陸機《文賦》前面一段論作文之動機，有以下幾句：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sup>7</sup>

- 3 鍾嶸《詩品·序》：「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見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漢城大學校文理科大學，1967年11月，頁27—28。）案此《序》自「楚臣去境」以下，鍾君所叙感蕩心靈之種種，絕大部分是怨情，並沒有前面所說「嘉會寄詩以親」和後面所說「詩可以羣」的功能。可參考錢鍾書《詩可以怨》。（載《文學評論》，1981年第一期，1981年1月，頁16—21。）
- 4 孔子在《論語·陽貨》篇提出了詩有興、觀、羣、怨四種作用。鍾嶸則只提到羣和怨。從「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兩句對學，可見「嘉會」句指詩對於「羣」的作用。
- 5 《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謂「羣」即「羣居相切磋」，那是指道德上的砥礪，與鍾君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
- 6 參考拙著《齊梁詩人與儒學》，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二十卷，1989年，頁195—220。
- 7 見《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0月影印重刻宋淳熙本，卷十七，頁二上至二下。

這幾句可以概括南北朝文學創作的主要動機。所以庾子山《哀江南賦序》謂：

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sup>8</sup>

而庾信此賦開首一段，正是自叙其先世的功業節操，節錄如下：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sup>9</sup>

這部分所佔篇幅超過四十句，把自己先祖從周、漢、晉、宋至齊梁各朝的功績依次陳述。也許由於賦尚鋪陳，加以六朝重門第，因此庾信縷述平生，先從世德說起。不過這類寫法，其實早見於古代經典之作。如《詩經·大雅》中的《緜》、《生民》、《公劉》，<sup>10</sup>《楚辭》中的《離騷》，<sup>11</sup> 都有尊美先祖的意識。這種意識本來是受儒家讚許的，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sup>12</sup> 這種觀念深植於人心，因此自秦漢以來，「先陳世德」的寫法殊為普遍。無論自叙或銘述他人景行，都不忘其先世。到了六朝，門第的觀念尤盛。「詠世德之駿烈」的篇章，應該是更受重視的。就拿晉宋之間來說，陶淵明的家世遠不及謝靈運顯赫，然而陶公《命子》一首，十章中就有六章敘述陶氏祖宗的光榮歷史。試舉三章為例，第一章述其宗族之始：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賓，世歷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第五章述族祖陶侃：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忘。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8 見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1月，頁94。

9 同上注，頁104、106。

10 《詩·大雅》中，《緜》敘述周人始祖古公亶父；而《生民》、《公劉》二詩，學者相信是敘述周民族祖先的史詩。

11 《離騷》起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即從其遠祖及父親說起。後世有些長篇自叙身世的賦，其作法可能即源於此。

12 見《論語·學而》篇。

## 第六章述祖父陶茂：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實茲愷喜。<sup>13</sup>

可注意的是，陶公和魏晉的作者，都習用四言以述祖德。如王粲有《思親詩·為潘文則作》，全詩用四言以叙母氏之德。<sup>14</sup>大抵用四言以尊祖德，旨在表現得典正隆重，可以承接《詩經》的傳統。如陶詩五言頗有東晉的語言習慣和風格，但《命子》一篇卻似乎力求追摹《雅》《頌》。陸機《贈弟士龍》十首中的第一首，按詩意是陳述祖德，正是用四言以求其典正：

於穆予宗，稟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惟帝念功，載繁其錫。其錫惟何？玄冕袞衣。金石假樂，旄鉞授威。匪威是信，稱平遠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極。<sup>15</sup>

述德之作，思摹《雅》《頌》，原不難理解。可是，謝靈運卻是用五言詩，即當時所謂「流調」去敬述祖德。<sup>16</sup>這正可略見他的性格。原來他不獨在「衣裳器物，多改舊制」，<sup>17</sup>就是在最隆重的述德之篇，也愛自行其是，用當時最流行的詩體歌頌自己最尊崇的祖父。<sup>18</sup>

13 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頁27—28。（此書以後引用時簡稱《陶集》。）

14 《思親》詩第一章：「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妣。躬此勞瘁，鞠予小子。」見吳雲、唐紹忠《王粲集注》，鄭州：中州書畫社，1984年3月，頁8。

15 見金濤聲點校《陸機集》，補遺卷第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月，頁155。

16 「流調」一詞見於《文心雕龍》，《明詩》篇云：「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見范文瀾《文心雕龍註》，香港：商務印書館，1960年7月，頁67。）《文心》所謂「流調」，指流行的詩體，反映了五言詩在當時普遍為人接受，雖非「正體」，卻也沒有軒輊之意。但晉人固有如摯虞之儔，仍然主張「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見嚴可均《全晉文》卷七十七所輯《文筆流別論》。）大抵到了晉代，仍然有一派觀念以四言為雅正之體。述祖宗的德業，用四言是合乎一般習慣的。明白了這個文學背景，始能理解大謝用五言寫《述祖德》的意義。

17 謝靈運本傳：「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見《宋書》卷六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頁1743。）

18 謝靈運尚有《贈從弟弘元時為中軍功曹住京》一首，其中第一章也是稱述功德的，用的卻是四言：「於穆冠族，肇自有姜。峻極誕靈，伊源降祥。貽厥不已，歷代流光。邁矣夫子，允迪清芳。」此詩見於《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本文所引則據興膳宏輯《謝靈運集外詩》，見興膳宏《謝靈運詩索引》（頁53）所附，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會發行，1981年。

## 三

本節先錄《述祖德》詩《序》及第一首原文如下：

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綵，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sup>19</sup>

這首詩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此詩自起句至「遙遙播清塵」，其實全是詠史詩的體格。試觀左思《詠史》第三首：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sup>20</sup>

寫夙所仰慕的段干木和魯仲連，二人與魏卻秦，有大功於當世。尤可貴者，則在功成不受爵，視富貴如浮雲。前舉陶公《命子》第五章稱頌族祖陶侃，也有「功遂辭歸」之句。這種操守本是中国傳統偉大政治家的最高典範，既合於儒家用世之旨，復與老氏標學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同調。<sup>21</sup> 這類人物，在歷史上頗有幾位，如下文提到的魯仲連、范蠡、張良等是。他們都是傳統上地位最崇高的政治家。《述祖德》詩中「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四句，包括了四位古人。即在左詩的段生和仲連之外，加上展季和弦高。四人於國家各有貢獻，但他們最值得稱頌的品德，卻在於「惠物辭所賞」。此與左詩「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辭稍異而意全同。詩《序》說：「事同樂生之時，志期

19 《文選》，卷十九，頁十九下至二十下。

20 同上注，卷二十一，頁四上至四下。

21 《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據《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運夷第九》，見嚴靈峯編《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第九冊。台北：藝文印書館 1965 年 3 月據明嘉靖九年顧春世德堂刊六子本影印，卷上，頁六上至六下。）末句諸本俱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惟通行王弼注本作「功遂身退」。（敦煌本有作「名成功遂」者，見敦煌卷子斯 798 號。程南洲《倫敦所藏敦煌老子寫本殘卷研究》書中影印此卷，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 年 5 月。）

范蠡之舉。」范蠡固然也是這一流人物。<sup>22</sup>至「臨組乍不綵，對珪寧肯分」二句，更與左詩「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如出一轍。大謝本來極讚賞左思，曾謂「左太沖詩，古今難比。」<sup>23</sup>分析了這類詩的背景，則《述祖德》的一部分用了全首左思《詠史》，就不難理解。

謝詩與左詩比較，只是多了首四句及末六句。當然末六句是必要的，否則全詩只是詠史，何嘗有稱述祖德之意？但綜觀全篇章法，顯然是有意先從古人之有達德者說起，然後接着述說自己祖宗。故在「遙遙播清塵」之後，用蟬聯的句法，接以「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李善注：「明哲，謂祖玄也。」<sup>24</sup>這本是誰都看得出的，問題只是何以用這樣的筆法。其實答案殊為簡單，作者顯然要把自己祖先納入歷史軌轍之中，以確定其地位。謝玄能接前輩達人之清塵，其德量自是無可懷疑。所以這首《述祖德》正面提及「祖德」的只有兩句：「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這樣的寫法固然有其說服力，因為那幾位古人，在傳統上確立了極其崇高的形象，而全詩也因此充滿了歷史意識。

尚可注意的，是前面說過，詩中所引古來達人，雖抱濟物之性，但其最高品德卻在「惠物」而「辭所賞」。而這裏卻只寫謝玄委輟道論，出山以康世難，未及其功成身退的事實。<sup>25</sup>但從另一角度看，這正是強調謝玄在用世之先，高卧名山；靖難之後，則不忘歸於山林。這種風範，更是大謝私心嚮往的。因為這表示了即使身在閑居，日後未嘗沒有用世的機會。在同屬早期之作的《撰征賦》裏，大謝也透露過這樣的思想：

世闕才而貽亂，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而枉志。

這幾句表示世既需才，故「幽人」不得不出。其後接着敘述其功業：

迨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澤而風靡，囂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綏帶。既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

22 謝靈運在長篇力作《山居賦》裏也提到張良和范蠡：「嗟文成之卻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自注云：「文成、張良，卻粒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見《宋書》本傳，頁1754—1755。）所謂「權榮素」，即衡量進退之際。根據老子的智慧，當然功成便須身退。

23 《詩品》左思評語：「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鍾嶸詩品校證》，頁36）

24 見《文選》卷十九《述祖德》詩李善注，頁二十下。

25 黃節注引《荀子》楊倞注謂「綴、止也，與輟同。」又引《晉書·謝玄傳》，謂玄上疏，有「從臣亡叔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之語。「『委講綴道論』，當指與安東山講道之時，既而委輟出山，以康世難也。」（見黃節《謝康樂詩注》卷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3月，頁21。）

而功成之後，則能捐棄浮名，投袂歸來：

值秉均而代謝，實大業之興廢。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勳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sup>26</sup>

據本傳，《撰征賦》是靈運「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而作的。<sup>27</sup>高祖是宋武帝劉裕，當時位為相國。諸謝心存晉室，在政治上是與劉裕對立的。劉裕崛起之際，靈運任撫軍將軍劉毅記室參軍。當前的大敵，正是野心勃勃的劉裕。劉毅軍敗為裕所誅，靈運的地位甚至生命實受威脅。其後劉裕版靈運為太尉參軍，本有安撫高門大族之意。<sup>28</sup>裕伐長安，靈運奉使慰勞，所作《撰征賦並序》近五千言。到底有多少誠意且不必說，但在靈運心中，「內匡寰表，外清遐陬」，「宏功懋德，獨絕古今」的人物，<sup>29</sup>最高的典範總是能够「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的。「遠期」自是指「心無忝於樂生」之志、「歸五湖之投袂」之舉。《撰征賦》與《述祖德》詩寫作時期不知孰先孰後。要是能體會其心意，則大謝在寫到自己最所景仰的祖父和政壇上的對頭，表露了同樣的理想，也不是不能理解的。《述祖德》第二首有兩句：「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簡直與《撰征賦》的「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二句同出一轍。<sup>30</sup>事實上，謝靈運自己也未嘗不以此自許。雖然他志大才疏，含恨以終，在歷史上不一定有多少人同情。而靈運功名不就，卻大有機會賦閑山居。言念祖業，其心境之複雜，可以想見。謝與陶一大異趣，是陶雖時有「終曉不能靜」之心，其心境與詩境大抵是平靜的。謝則雖刻意棲心清曠，其心境卻是不平靜的時候居多。<sup>31</sup>這一點在下文再論。

26 《宋書》本傳，頁 1751 — 1752。

27 謝靈運本傳：「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為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見《宋書》，頁 1743。）

28 據本傳：「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為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為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為太尉參軍，入為秘書丞。」（見《宋書》，頁 1743。）本傳敘述頗簡略，Frodsham 所撰謝靈運傳記參考了《宋書》其他部分和《資治通鑑》的資料，分析其事始末，遠較詳細。見 J. D. Frodsham, *The Murmuring Strea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p. 16 — 18.

29 並見《撰征賦》序文，《宋書》，頁 1744。

30 「高揖」二句下李善有注云：「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晉有七，故云七州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頁二十一上）

31 《山居賦》有一節說山居躬耕，足以濟衣食：「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規節，遞藝遞熟。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自注復云：「謂之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自立耳。」（見《宋書》，頁 1760。）此與陶詩「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陶集》頁 84）、「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飲酒》第十首，頁 92）、「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和郭主簿》第一首，頁 60）諸詩之大旨何其相類！當然，謝到底是知之而未能行之，這也可說是「心跡雙寂寞」（《齋中讀書》詩句）的表現。

第二，此詩首四句：「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可說是全詩引子，為左詩所無。這四句的作用是概括寫出「達人」的特性：「貴自我」，一也；「高情屬天雲」，二也；「兼抱濟物性」，三也；「而不纓垢氛」，四也。這些特性都是中國傳統上最偉大的政治家所具備的。與左思比較，「貴自我」就是左的「不羈」；「兼抱濟物性」就是左的「遭難能解紛」；至於「高情屬天雲」、「而不纓垢氛」，則略同於左詩的「高節卓不羣」。不過儘管詩意近似，寫法卻不一樣，不然何以成大謝的風格？尤其有意思的是「貴自我」三字，可視為大謝一生寫照。我們看他的為人，自衣裳器物，乃至進退出處，皆愛自行其是。一生之中，有兩件事最值得注意。其一是大謝與廬陵王以文義相推。這容或有政治因素。但廬陵王義真真是宋武帝之第二子，為宋文帝之兄，而深為文帝所忌。廬陵王既見害，文帝問靈運：「自南行來，何所制作？」靈運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sup>32</sup> 不要忘記此詩充滿怨憤之情，如下面幾句：

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sup>33</sup>

這些話豈是雄猜多忌的君主所願聞的？能够這樣坦率，正是「貴自我」的表現。另外一樁事情是靈運出為永嘉太守，私意任事三年。赴任途中經祖父會稽故宅，有《過始寧墅》詩，談到自己的意願：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粉檟，無令孤願言。<sup>34</sup>

但到底沒有履行三載之期。且從本傳看他的行蹤：

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sup>35</sup>

當時靈運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在朝廷密切注意之際遽爾去職，是極不尋常的舉動，所以幾位從弟要「與書止之」。可是他到底有個人的想法。剛離開永嘉的時候，他作了一首《初去郡》詩，其中有云：

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

32 見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三，頁二十下。

33 同上注，頁二十下至二十一上。

34 同上注，卷二十六，頁二十四下至二十五上。

35 《宋書》，頁 1753 - 1754。



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驚修垌。溯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sup>36</sup>

這幾句對自己的抉擇作了交代。別人可能咎其舉止不可測，在他自己卻覺得正該如此。此之謂「貴自我」。因為前此是「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今日則一反二十載之「負心」。詩中也引用了四位古人：周任、長卿、尚子、邴生。接着的兩句云：「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可見他在「貴自我」的同時，仍然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古人之不羈者既多特立獨行，則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自然充滿信心。《初去郡》全詩用了多句寫內心的希冀和矛盾，到了確定個人今後方向的時候，心境頓覺豁然開朗，接以「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兩句，一派悠然自得、恬暢自足的樣子。這種心境，不妨配合《述祖德》詩去看。

第三，第一首《述祖德》詩的首四句，還有一個語言上的特點。這就是從句法看，首四句全是散文的寫法，是過江玄言說理詩的調子。<sup>37</sup> 試從語法結構分析，這四句的主語是「達人」。在語法概念上，這二十個字其實只構成一句。這一句的主語「達人」，既貴乎自我，其高情復上屬天雲，兼之懷抱濟物之性，然雖接乎物，而不染於塵垢。這樣的結構，在左思《詠史》也有一首：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高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sup>38</sup>

此詩以荆軻領起下面數句，<sup>39</sup> 正是大謝《述祖德》第一首的結構。這類結構在漢魏未為多見，唯傳李陵《錄別》詩第一首有之：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sup>40</sup>

但李詩的年代不能確定，很可能是晚於魏晉的擬作。稍晚於建安有阮籍的《詠懷》詩，其中一首云：

36 《文選》，卷二十六，頁二十七下至二十八上。

37 這裏姑且用「句」指五言詩的五字單位。從語法角度看，五字未必構成一「句」。如果借用西方詩歌的概念，稱五言詩的每五字為一「行」，以一行為一單位，也許可以解決問題。但古代中國詩從不分「行」，因此也不好借用。要注意的是我們習慣上所說的「一句」，只是五言或七言詩一個五音節或七音節的單位，跟語法上指有完整結構的句子含意並不相同。

38 見左思《詠史》第六首，《文選》，卷二十一，頁五下。

39 其實此詩五六兩句「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也是上承荆軻為主語的。

40 《古文苑》有李陵《錄別詩》十首附在漢詩卷十；而李陵衆作，自顏延之以來，學者多有疑之者。此詩可見於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9月，頁339。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馬遠行役，受命念自忘。<sup>41</sup>

四句皆承首句的「壯士」。但到了東晉，這種句法似乎多起來，如干寶、楊方的詩都有這類結構。<sup>42</sup>倘若考慮東晉詩傳世極少的情況，則在僅存的詩作中有幾個例子，就值得注意了。再看生於東晉末年的陶淵明，這種句法就更為顯著。如《雜詩》第一首：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sup>43</sup>

《飲酒》第十二首：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sup>44</sup>

第十四首：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sup>45</sup>

第十八首：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sup>46</sup>

《贈羊長史》：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sup>47</sup>

這樣看起來，《述祖德》的首四句，其實是當時頗見流行的一種寫法。再從近一點追尋，則靈運族叔謝混有一篇誡諸族子的「詩」，全篇大部分以四句品評一人，正是這種筆法。據《南史》：

41 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504。阮籍《詠懷》尚有一首：「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璫。」（同書，頁 500）句法頗相似，此首疑出於曹植《雜詩》第四首：「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同書，頁 457）這類寫法與李陵那一首很接近，遂欽立以為李詩是後漢末年文人所作，似不無所見。

42 干寶詩今只存六句。其《百志》詩云：「壯士稟傑姿，氣烈有自然。俯仰羣衆中，胡能救世艱。」（《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853）楊方《合歡》詩第四首：「飛黃銜長轡，翼翼回輕輪，俯涉淥水澗，仰過九層山。」（同書，頁 861）

43 《陶集》，頁 115。

44 同上注，頁 94。

45 同上注，頁 95。

46 同上注，頁 97—98。

47 同上注，頁 65。

[混]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儻，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sup>48</sup>

《南史》所謂「韻語」，如果理解爲「押韻的語言」，倒是貼切不過的，因爲謝混此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像押韻的散文多於像詩。換句話說，即使算是「詩」，也是用了大量散文句法的詩。這正是東晉詩歌「因談餘氣，流成文體」的特色。<sup>49</sup>大謝那四句比起他的一般詩句，結構很不同，反倒像散文化的陶詩，如陶的《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sup>50</sup>

格調極似謝混的「韻語」和大謝的「達人」數句。《述祖德》作於何時難以確考，但似乎是早年之作。<sup>51</sup>那末，是不是可以說，大謝早年的詩作還頗有過江的調子，甚至可說與陶同調呢？《述祖德》全詩用偶句不少，但除起數句外，尚頗有散文的句子，如「清塵竟誰嗣」、「屯難既云康」之類。從五言詩的發展看，東晉以後是大變之世，陶謝都是過渡的人物。陶之清淡，後人率喜道之。其實這種清淡，正是少用詩的詞藻，多用散文化的句法，也就是沿過江而來的風格。謝則後人每評爲繁縟，但繁縟正是變平淡之體而成的，也就是多用濃采、少用散文的句式。其實比起齊梁作者，謝之巧綺遠爲不及。從《述祖德》詩倒可以看到謝詩原也不無過江的影響。不過從時間說，他變得早變得快；從語言風格說，他變得明顯。大謝在當時備受推崇，正可見詩歌流變的消息。這是我們讀《述祖德》詩的另一點體會。

#### 四

至於《述祖德》詩第二首，原詩如下：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賊圯。

- 48 見《南史》卷二十《謝弘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6月，頁550。觀同時的詩作，如陶公《責子》，每個兒子用兩句概括，其實同於謝混的「韻語」。在性質上，這些句子也用散文，如「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全是散文句法。不過陶公在篇末概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深有自嘲意味，所以《責子》是詩，謝混的「韻語」則不能算詩。
- 49 《文心雕龍·時序》篇：「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文心雕龍註》，頁675）所謂「因談餘氣」，是因着清談的風氣，以玄言入詩。故詩多近口語，頗用散文句法。
- 50 《陶集》，頁84。
- 51 Frodsham 亦謂此二詩可能是早期之作，與此相較，《山居賦》殊爲晚出。（見其書第二冊頁103。）如其說可信，則二詩之寫作年代必在東晉亡之前。

萬邦咸震懼，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莪粉梓。  
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此詩具體寫謝玄的功業，但主題仍與第一首有相通之處。謝玄功成身退，「遺情捨塵物」，正是第一首「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的「達人」所宜有的行爲。詩中寫玄建功立業，並不作過分詳盡的描述。至於「覽相謝世運」以後，標其高舉，是頗細緻的描寫。「隨山」數句叙其山居生活，是謝詩最常見的題材。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他的山水詩，尤其是歌頌山水之美的句子。前面說謝靈運是極端「貴自我」的，從《述祖德》第二首更可見他進一步肯定「自我」。他父祖築室始寧縣，傍山帶江，成爲他日後幽居的基地。《山居賦》有幾句說：

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sup>52</sup>

自注云：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遠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sup>53</sup>

賦的本文和自注，都可作《述祖德》詩的注脚，更是讀大謝山水詩所不宜忽視的。其實，謝的最大苦惱，正是雖協山居之趣，卻少了乃祖的功業。志不獲申，心懷憤憤，時而銳意進取，時而深自隱退，行事常出人意表乃至乖戾，其實可說是心理上極度不平衡的表現。讀大謝山水詩，有時倒有一個感覺，就是詩中的境界不全是平靜的。即使得一時之平靜，也是經過內心一番掙扎而得來的。如《富春渚》：

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sup>54</sup>

《晚出西射堂》：

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sup>55</sup>

52 見《宋書》，頁1756。錢鍾書以爲「覽明達」即《述祖德》詩之「賢相謝世運」云云，《文選》李善注中正引靈運此處自注。見《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頁1289。

53 同上注。

54 見《文選》，卷二十六，頁二十五下至二十六上。

55 同上注，卷二十二，頁九下至十上。

二詩寫到最後，雖說終能懷抱昭曠，幽獨有託，但那已是感念了萬事零落以後的體會，心裏的鬱結是否那麼容易安排，不禁叫人懷疑。再以謝的《齋中讀書》與陶的《讀山海經》第一首比較。《齋中讀書》：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酒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  
卧疾豐暇豫，翰墨時閒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  
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56

《讀山海經》第一首：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57

兩首詩都是寫讀書，但讀書的心情大為不同。謝之讀書，是心跡雙寂寞以後，無可奈何的寄託。「懷抱觀古今」之際，竟沒有海闊天空的自得，反而深感無論執戟(干祿)、耕稼(田居)都未必可以安身，唯有託之莊子「達生」的哲學。陶則無論正在耕種讀書，都心地澄明。詩中的衆鳥草木，乃至微雨好風，都充滿了怡悅之情。「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的心境，很容易使讀者受到感染。是以讀謝詩的經驗，跟讀其他山水詩人之作不同，我們應該從他的背景去瞭解。

從另一角度看，則大謝雖貴乎「自我」，卻是深受傳統羈絆的。古來賢達之士，既建大功於當世，然後可以「盡高棲之意得」。而謝之山棲，則滿是無可奈何的情懷。《山居賦》：

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 58

正可見其牢落之思。潘岳志慕功名，而浮沈下位，其《閑居賦》末段云：

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 59

二家同以「拙」自解。但尋謝之苦心，尤有過於潘者，這當是由於家世對他構成壓力。靈運早歲即襲封「康樂公」，爾後世稱「謝康樂」。其實這樣的家世，卻是他終生不快樂的淵源，這點倒是讀謝詩不可不深加體會的。

56 同上注，卷三十，頁七下至八上。

57 《陶集》，頁 133。

58 《宋書》，頁 1756。

59 《文選》，卷十六，頁八上。

## 五

我們讀《述祖德》詩，固如前文所云，不宜忽略此類內容在當時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這兩首詩也可以幫助我們觀察晉宋之間詩體流變之跡和大謝山水詩的重要背景。

此外，這兩首鮮為人注意的詩，還可以視為傳統文人詩作的某一個原型。中國士人向來最關心的，是出仕與否(出處)、出仕後的事業(立功)，以及功成之後如何自處諸問題。這幾個問題互相牽連。謝家的第一流人物謝安，在出處之際，引起不少議論。其初安高臥東山，當時有「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之說。<sup>60</sup> 其後匡輔晉室，任總中臺。然而謝安雖然「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sup>61</sup> 但在成就大業不久即物故，沒有退居江海的餘地。本傳稱他「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sup>62</sup> 誠不難理解。至於謝玄，雖說得以「解駕東歸」，但仍居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之職，且未幾而卒，故本傳說他「卒于官」。<sup>63</sup> 《述祖德》詩序謂其「拂衣蕃岳，考卜東山」，《山居賦》注稱其「選神麗之所，申高棲之意」，其實不無曲筆，以配合功成身退的理想。所以，與其說大謝《述祖德》二首是評述或歌頌乃祖功德，不如說大謝在詩中投射了他心目中偉大政治家的理想。這理想既是他一生的目標，更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最高典範。

儒家本來確定士人有澄清天下的任務。偉大的政治家不在於能以霸力服人，而在於能建立和諧而井然有序的社會。用《謝安傳》中史臣的話說，就是「彝倫以之載穆」。<sup>64</sup> 孟子說：「天下溺，援之以道。」<sup>65</sup> 謝詩中「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二句，可謂充分體認了儒家理想。而功成之後，達人自當「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如果山水詩是在捨塵物、觀丘壑之餘寫出來的，那麼山水之於人，除了平靜，更是怡然可樂、靄然可親的。山川之美更可以跟作者的酣暢自足融和在一起。可惜大謝的山水詩只能與他胸中牢落不平之慨相結合；而山水對他來說，只是提供忘憂遣悶之趣。在不斷自我驅策、志不獲展的心理壓力下，人與山水渾化而為一的境界，在大謝詩中是不容易達致的。

60 《晉書》卷七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2073。

61 同上注，頁2090。此為「史臣」之語。

62 同上注，頁2076。

63 同上注，頁2085。

64 同上注，頁2090。《文心雕龍·程器》篇云：「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又云：「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文心雕龍註》，頁720)劉勰認為學文之士也要達於政事，奉時騁績。這可以代表儒家對理想讀書人的要求。《謝安傳》中史臣用「彝倫以之載穆」一語加之於謝安，可說是中國傳統裏對讀書人的最高讚揚，可參考：A. F. Wright "Values, Roles, and Personalities"，此文收在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edited by A. F. Wright and D. Twitche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5-6.

65 見《孟子·離婁上》。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A Study on Two Poems by Hsieh Ling-yün Entitled "Telling of the Virtue of My Grandfather"


(A Summary)

Dang Shu-leung

Though the two poems of Hsieh Ling-yün, entitled "Telling of the Virtue of My Grandfather", are often neglected by later critics who saw Hsieh mainly as a nature poet, they are important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fucian literary tradi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 these two po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during Chin and Sung dynasties by analyzing their subject matter, structure,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techniques involved. When Hsieh praises the virtue of his grandfather, he is, in fact, projecting the ideal of a great statesman. Hsieh himself had been striving after such an ideal which remained an unfulfilled ambition. This distress led Hsieh to resort to nature. By reading these poems carefully one may even gain some insight into his nature poem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